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9.01.016

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中国出场^①

王海龙

(兰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在中国的出场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该话语体系植根于帝国主义时代中华民族艰难探索的具体历史语境,并因典型的差异特征,在与众多同时在场的话语体系相互交锋的实践之中,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出场路径,其出场形态在从隐匿到彰显的过程中,又可详细划为“文本形态”与“理论形态”。从五四运动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不仅依然“在场”,并会在未来持续“在场”。

关键词:五四运动;出场;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9)01-0120-07

“话语体系”是集概念、范畴、命题和表达方法等于一体的“话语”综合,其实质为一种意识形态化的上层建筑,充分表征着一个社会的思想内涵与时代精神。因社会形态、发展阶段和实践方式等因素的不同,人类产生了诸多话语体系,这些话语体系既相互交融又彼此竞争甚至冲突,在历史的进程中遵循着“出场”“在场”和“退场”循环规律。在现代国际社会之中,西方话语体系处于强势地位,并进一步衍生出强大的国际话语权,排挤和消解着其他话语体系。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在经济建设领域取得了享誉世界的成就,但在话语体系方面未能有效重视,“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①。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是中国话语体系最为核心的组成部分,而中国话语体系的滞后在根本上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式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②。法国学者德里达对于“马克思的幽灵”还是否“在场”的追问依然值得现代人所省醒。

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接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成为中国人民“解释世界”并“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从五四运动至“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跨越一个世纪的“时间间距”并依然“在场”,以客观事实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真理性,证伪了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伴随苏东剧变与苏联解体而“历史终结”的观点。正如伽达默尔所言,“时间距离……才能把我们得以进行理解的真前见与我们由之而产生的误解的假前见区分开来”^③。但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仍旧存在着“退场”的风险,如何建构起符合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则成为了一项极其紧迫而重要的任务。本文力求从“出场语境”“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等三重维度梳理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中国出场逻辑,溯源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在中国的原初状态,以期为新时

① 收稿日期:2018-09-22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17LZUJBWCX014)

作者简介:王海龙(1988-),男,河南洛阳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②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③ 伽达默尔:《诠释学 I:真理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22页。

代下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 历史地平线的转换:出场语境的阐释

话语体系是理论思维的表征,而任何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①,这就决定了每一种话语体系的显现都受制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即出场语境。资本全球化乃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出场的历史地平线,“历史地平线的转换就呈现出新旧全球化时代的大转换”^②。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已经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的工业全球化时代,彰显出了历时态特征。

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首次“出场”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资本主义社会实践的解读与批判。在18世纪60年代之前,各个民族、国际和地区之间虽然也存在多元联系,但囿于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彼此之间仍然未能形成世界范围内的普遍交往。所以,“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③。英国工业革命以降,机器大工业所催生的新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就了人类社会亘古未有的巨大变革。社会化大生产不再桎梏于单一国家,而是在国际分工的过程中塑造了世界市场,从而成为“世界历史”生成的典型表征。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正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即全球化的初始塑形时期。该时期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伴随殖民扩张与掠夺统御世界的过程。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形态的变化,马恩时期的全球化嬗变出了新的样态。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必然引发生产的集中,而生产的集中又必然酿成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国内市场未能满足资本对于垄断利润的疯狂攫取,从而导致资本输出至较落后的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主体性联合,又形成了国际性垄断联盟,在全球范围内瓜分世界,帝国主义

时代到来了。列宁曾明确指出,“垄断代替自由竞争,是帝国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是帝国主义的实质”^④。帝国主义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竞争,“与之并存,因而产生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⑤。帝国主义在国际政治中的延续体现为帝国主义战争,实质是帝国主义对于民族国家的侵略。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历史地平线已然是全球化从工业资本竞争所生成的世界市场体系转向了金融资本垄断下的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体系。

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在中国的出场,植根于帝国主义时代中华民族艰难探索的具体历史语境。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帝国主义国家对于全球范围内殖民地领土早已瓜分罄尽,整个世界体系呈现出两极样态,“一极是少数帝国主义宗主国,另一极是广大受剥削压迫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⑥,而中国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面临着内忧外患。中华民族无数仁人志士在一系列“救亡图存”运动中相继提出内涵各异的思想主张,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话语体系。例如,洋务运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戊戌变法的“保国、保种、保教”,辛亥革命的“民族、民权、民生”等。这些话语体系虽然陆续的“出场”,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具体写照,但却在历经社会实践检验后纷纷“退场”。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话语体系仅仅作为“批判的武器”,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其背后的思想未能真正成为时代发展与运行规律的写照,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任务。毛泽东曾研判:“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在俄国的“出场”引起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关注。列宁创造性地发展与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完善与改造了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列宁以帝国主义为时代背景,通过分析世界总体格局,得出了“我们应当把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同民族问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4页。

②任平:《论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的辩证视阈》,《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5期。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页。

④《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4页。

⑤《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0页。

⑥丰子义:《全球化的理论与实践: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6页。

题的革命纲领联系起来”^①的判断。民族解放运动与无产阶级革命相结合,成为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新内涵。帝国主义之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因其残酷性本已引发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对于资本主义文明内在缺陷的审视与思考,而中国作为战胜国在“巴黎和会”受到的非公正待遇更加使中国人民认知到帝国主义联合压迫中华民族的实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蕴含着彻底的反帝国主义思想和鲜明的民族解放思想,其在中国的全面“出场”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五四运动则为这种“出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

二 交往实践中的差异:出场路径的祛魅

话语体系的出场路径就是话语体系选择出场的方式、时机和轨迹。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造就着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必然出场,但是这种必然趋势并非“先验的自在”,而要依赖于一定的路径,路径祛魅的实质则为“出场呈现的差异”^②。在五四运动中,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在中国的出场绝不是其在俄国在场状态的简单复制,而是其内在思想与意义的重新布展和传播,该话语体系因其典型的差异特征,在与众多同时在场的话语体系相互交锋的交往实践之中,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出场路径。

在五四运动中,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核心范畴即客观真理性,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得以出场。“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最先被中国先进分子所接受和传播,这种境况在五四运动中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开始在学生及工人运动中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引发了实用主义者们的抵触甚至反对。胡适于1919年7月在《每周评论》杂志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其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

事”^③,但是这种行为却有着巨大的危险,“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问题’,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法了”^④。在该文之后,胡适又陆续书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系统阐述了其将马克思主义视为“误谬的见解”。胡适思想的实质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即实验主义)在中国的变种,胡适曾这样评价杜威:“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⑤他公开宣称:“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⑥在实用主义的话语体系中,相对性是核心范畴,一切主义都并不具有普遍的客观真理性,即使有一种主义被视为真理,那也仅仅为相对性的真理而已,“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⑦。与此不同的是,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之中一再强调,虽然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但是“整个来说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⑧。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与实用主义话语体系在核心范畴上就产生了根本性的冲突,所以胡适等实用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极力批评与反对则成为了逻辑的必然。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驳斥胡适等实用主义者的理论斗争中,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客观真理性。李大钊在1919年8月亦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与胡适针锋相对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旗帜鲜明宣布了自己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政治信仰,批判了将“问题”和“主义”完全割裂的错误观点,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客观真理能够为自身提供观察自身命运的指导,“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那一国,大致都很相同”^⑨。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李大钊在此文中的思想已经蕴含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客观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智慧光芒:“一个

①《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8页。

②任平:《走向差异之途的马克思主义出场学视域》,《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5期。

③胡适:《胡适文存(第一集)》,上海亚东出版社1929年版,第148页。

④胡适:《胡适文存(第一集)》,上海亚东出版社1929年版,第153页。

⑤胡适:《胡适文存(第一集)》,上海亚东出版社1929年版,第199页。

⑥胡适:《胡适文存(第一集)》,上海亚东出版社1929年版,第96页。

⑦胡适:《胡适文存(第一集)》,上海亚东出版社1929年版,第148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9页。

⑨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页。

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①由于《每周评论》杂志停刊,“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未能得以延续,但正是在这种争论之中,作为客观真理的马克思主义开始被广泛的传播,为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出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五四运动中,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表达特征即鲜明的革命立场,在社会主义之辩中得以出场。“问题与主义”争论之后,中国出现了许多宣传和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报刊和文章。列宁领导下的苏俄政府对华发表宣言,承诺放弃帝国主义俄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和侵略土地,并建议构建两国平等友好关系,这进一步激发了国内认知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浓厚兴趣。受此影响,在上海、北京和长沙等地,共产主义小组相继建立,推动着工农大众的觉醒,这种形势引起了国内以张东荪、梁启超为代表的反对与扞拒。张、梁等人倡导基尔特社会主义,该主张在中国的出现与西方哲学家罗素的来华访学息息相关。罗素推崇“新实在论”,认为世界是感觉与知觉的复合,所以世界的改造必须启于精神方面,这样物质方面才能水到渠成。罗素的哲学成为张东荪等人的思想根源。张东荪率先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大家切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同年又在《改造》杂志中系统阐释了其本人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梁启超亦通过《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表达了对于张东荪的赞同与声援。张、梁等人虽然在表面上认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来临的观点,但却将资本主义视为中国目前的必然出路,“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②。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纷纷发表言论对张、梁等人进行辩驳,陈独秀在广州陆续致信罗素和张东荪,

并将信件整理后以《社会主义讨论》为题刊登于《新青年》上,摈斥他们“虽不明言崇拜资本主义,其实所谓不讲主义,只讲发达实业,结局自然要归为资本主义上面去”^③。李达在上海发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和《社会革命的高樞》,李大钊在北京发表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甚至远在法国的蔡和森也发表了《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除张、梁之外,“彭一湖、蓝公彦等人为代表,主张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和“以张君劢为代表盛赞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④,这些主张亦先后被彻底的驳斥。无论是基尔特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抑或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这些思想的实质乃是一种改良主义而已,所以这些思想的话语表达特点就在于处处回避对革命的关照。与之相反,马恩宣称:“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⑤在五四运动时期,早期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在与各个“伪社会主义”辩驳中,昭彰着鲜明的革命立场,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统一于实践性和科学性之中,为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在中国的出场确立了基本路线。

在五四运动中,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主旨命题即无产阶级专政,在反对无政府主义之中得以出场。无政府主义于17至18世纪的欧洲就已出现,近代以降,蒲鲁东成为无政府主义的“第一人”。五四运动之前,无政府主义者俄国克鲁泡特金的思想就已被传入中国,并被一些知识分子所接受。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流行主要有着以下原因:占有显著优势的小农经济造就了绝对数量极大的小生产者群体,成为无政府主义理想的传播基础,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之下,小生产者既有着革命诉求,却又对阶级斗争心存保留,转而寄希望于“互助”“性善”等抽象的人性论,而中国传统道家学中的“虚无”思想也成为无

①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页。

②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中共党史教研组资料室:《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三次论战资料选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42页。

③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中共党史教研组资料室:《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三次论战资料选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43-144页。

④蔡韦:《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反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3-64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35页。

政府主义在中国的思想土壤。需要指出的是,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曾经发挥了一定的反封建作用,但同时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之中造成了思想混乱。“十月革命”爆发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空前传播,而无政府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逐渐变化。无政府主义刊物《劳动》在1918年曾发表《俄罗斯社会革命之先锋列宁事略》一文,高度赞扬了“十月革命”的意义,“现在我们中国的毗邻俄国,已经光明正大的做起贫富一班齐的社会革命来了”^①。而到了1919年,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发生了转折。黄凌霜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马克思学说批判》表明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易家钺继而在《奋斗》杂志发表的《我们反对“布尔什维克”》一文中更加明确的表示:“我们不承认资本家的强权,我们不承认政治家的强权,我们一样不承认劳动者的强权。”^②与此同时,无政府主义刊物也频频出现,例如北京的《奋斗》《北大》和《社会运动》等,上海的《自由》《革命》等,广东的《民风》和四川的《半月刊》。面对这种境况,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对无政府主义展开了有力批判。《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陈独秀的《谈政治》《社会主义批评》和《讨论无政府主义》等一系列文章,清晰的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共产党》杂志公开发行,亦陆续发表了李达的《无政府主义之解剖》《社会革命的商榷》等反无政府主义专文。值得注意的是,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就已经认知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毛泽东在与蔡和森的通信中强调:“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③远在法国的周恩来亦认为:“无政府主义……只会高谈那空想的艺术,高谈几个‘真’‘善’‘美’的名词……竟无什么具体主张。”^④经过激烈的论战,无政府主义者对于社会发展规律认知的缺乏得以明了,他们“不懂得阶级斗争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创造力量”^⑤。马克思早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就

指出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转变,“这个时期的国家职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⑥。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是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则是走向该目标的必然过程。在五四运动中,通过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论战,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命题在理论上被证明,为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在中国的出场指引了明确的方向。

三 时空与真理的显隐:出场形态的厘定

话语体系的出场形态绝非是一种“脱域”的存在,而是受制于一定历史语境,依赖于一定路径。在五四运动中,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在帝国主义的时代语境下,与众多在场的话语体系之间的争鸣中才得以出场,其出场形态作为真理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殊的时空背景之下,从隐匿到彰显的具体表现,又可详细划为“文本形态”与“理论形态”。

在五四运动中,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出场的文本形态表现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原文及相关著作的引介。“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该论断成为一种普遍的共识,但我们不能将其理解为在“十月革命”之时,马克思主义就已然从俄国被完全引入中国。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被详细而系统的阐述,更遑论话语体系。诸如马君武于1903年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之后仅附录了马恩部分著作名称,朱执信于1906年在《德意志革命家小传》一文中只节译了《共产党宣言》,而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主旨命题、核心范畴等亦被片段化、零星式的理解。值得注意的是,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于马克思主义主旨思想的介绍要先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引进,而这种先后之别的起因正是源于上述理

①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研究室:《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70页。

②丁守和,殷叙彝:《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21页。

③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2页。

④金冲及:《周恩来传(1898-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78页。

⑤《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94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4页。

解形式所造成的学理之争。例如,李大钊于1919年5月在《新青年》中发表了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中“他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是持一种修正的观点”^①,同年,国民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胡汉民著《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予以驳斥。基于学理方面的争论,势必推动着文本的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较大规模翻译成为逻辑的必然,以《新青年》为代表的左翼期刊、杂志则成为该活动的主阵地。例如,1919年5~11月,《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期间连载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译文(即《雇佣劳动与资本》);1919年11月,《公民》月刊相继刊发《共产党宣言》部分译文、《资本论》序言译文;1920年4月,《建设》发表了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三部分译文;1920年10月,陈望道第一次翻译且出版了《共产党宣言》汉译版全文;1921年1月,《东方杂志》发表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部分《序言》译文;1921年5月,《共产党》月刊首发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汉译版。“据不完全统计,仅‘五四’运动后的半年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报刊达200多种,分布地遍布全国各主要省会城市。”^②不仅如此,西方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著作诸如考斯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也被翻译至中国。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经典原文及相关著作的引介,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以文本形态在中国得以初步性的出场。

在五四运动中,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出场的理论形态表现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主体性理解。马克思曾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③自“鸦片战争”伊始,中国逐渐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一系列改良运动均以失败告终。“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王朝,使“民主”与

“共和”观念普遍流传,但依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性质,中华民族仍旧饱受欺凌与压迫。一言蔽之,“救亡图存”是中国最为迫切的“需要”。对于具有浓厚家国情怀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而言,最吸引其的便是能够彻底实现社会完全变革的理论。“十月革命”之时,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所孕育的巨大革命力量引起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率先关注。“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④。正因为马克思主义相较于以往任何理论具备着彻底的革命性,一部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期间迅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从而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但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在中国的出场初期,对其内涵的不完全理解也造成了一种现象,虽然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但其在五四运动及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却十分重视阶级斗争理论。陈独秀在读《共产党宣言》之时,便认为,“这书底精髓,正是根据唯物史观来说明阶级争斗的”^⑤。毛泽东回忆起1920年所阅读的《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等马克思主义著作之时,“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⑥。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者将阶级斗争理论作为解释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中国的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首次登上历史舞台并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的力量”^⑦。伴随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及被积极接受,工人阶级的统一性马克思主义组织即中国共产党即将成立。重视阶级斗争理论固然是革命实践的“需要”,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但确也未能全面而系统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为日后中国共产党的历次“左倾”错误埋下伏笔。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阶级斗争理论的强调,体现为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以理论形态在中国的阶段性出场。

①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2页。

②丁守和:《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2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0页。

⑤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96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0页。

余论

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在中国已然“在场”百年,虽然目前面临着一些挑战,但是如果我们返回至五四运动时期以分析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在中国的出场语境、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就会发现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不仅不会“退场”,而且能够在未来持续“在场”。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彻底摆脱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与压迫,而自1979年以来,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综合国力空前增强、国际地位明显提高。但是中国的独立与发展仍未脱离马克思所揭示的全球化时代,资本仍然作为“普照的光”,在世界范围

内发挥着重大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宏观历史语境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征途里,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核心范畴、主旨命题与表达特征等依然被广泛接受,体现着主流的话语地位。需要指出的是,具体历史语境即深入推进的全球化与变化的出场路径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指引,共同造就了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崭新出场形态。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为代表的著作成为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在中国出场的文本形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为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在中国出场的理论形态。

The May 4th Movement and the Chinese Appearance of Marxist Discourse System

WANG Hai-long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May 4th Movement, the appearance of Marxist discourse system in China is an inevitably historical trend, which is rooted in the concretely historical context of Chinese nation's arduous exploration in the era of imperialism, because of typical difference which creates an appearance approac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y mutually crashing with many other contemporary discourse systems during the interactive practice, and whose appearance form can be divided into “text form” and “theoretical form” from the process of concealment to manifestation. From the May 4th Movement to “the new era”, not only does Marxist discourse system is still “present”, but also it will be continuous “present”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the May 4th Movement; appearance; Marxism; discourse system

(责任校对 钟丽)